

今天，我们该如何讲述中国农村

——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谈起

何吉贤

跨越将近30年的沧桑巨变，小说《平凡的世界》被搬上荧屏。经历了春节城乡间大回流、故乡亲情洗涤、怀旧潮冲击，目睹了故乡的或繁荣、或萧条，或昂扬、或消沉，观众在荧屏前共享黄土上孙氏兄弟和众乡亲的人生悲欢浮沉，上了年纪的似乎劈面看到了30年前的自己，年轻者也似乎看到了某种“来路”：1975年到1985年是改革的起点处，也是农村与改革的关系最为融洽的十年，摆脱饥饿和贫困的勇气和决心如此强烈；青春涌动、意志强悍，“世界”遥远而美好，人可以“平凡”；而要走向“世界”；卑微的平凡世界中，因为诚实的劳动，平凡的人获得了尊严，镌刻在当代社会结构中的身份政治才有了打破的可能；在这个新历史的起点上，改革是上至各级干部下至普通农民的共识。在电视剧的结尾，一种根基于普通中国农民的中国梦似乎在空气中开放，“平凡的人照样也能过得不平凡”，这不正是改革开始处的某种共识和动力吗？

不可否认，电视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对原著的忠实有关，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无疑已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它不仅深刻地记录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而且在一代代人的精神成长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大约在最终完成三卷本《平凡的世界》4年后，路遥又写了长篇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在这篇创作谈的结尾，他写道：“无疑，这里所记录的一切和《平凡的世界》一样，对我来说，都已经成了历史。一切都是当时的经历和认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生活以及艺术的变化发展，我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和发展。”由于路遥的英年早逝，我们无从得知在他的认识和思考中，问题意识的升降变化；我们也无从知道，假如路遥活到今天，让他来评价他这部长篇作品的电视剧改编，甚至由他自己来操刀改编，会是什么样子。

尽管电视剧编剧声称尽量忠实于



《平凡的世界》剧照

原著，而且采取了正面强攻的写实手法，但理论上任何改编其实都是当代叙述，我们还是能解读出很多当代文化、社会和思想的症候，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从小说到电视剧，第一主人公如何从孙少平变成了孙少安。

小说《平凡的世界》有3条线索，分别以3个人物来组织。一条线是田福军，这可称为一个改革题材的小说，提供了一条从省、地、县到公社、村的线索，故事的展开围绕“要不要改革”；另一条线是孙少安，可以称作农村题材小说，主要展示乡村的日常生活及其矛盾；第三条线是孙少平，是一个个人出走和成长的故事，似乎回到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路遥超越通俗

小说之处在于对时代和日常生活有整体和超越性思考的努力。

电视剧对原著的最大改动之处是扩大了孙少安的线，保留和适当增加了田福军的线，收缩和改变了孙少平的线。具体而言，电视剧用大量篇幅为孙少安增加了很多故事，如集体化时期如何反抗过去的农村政策；旱灾中如何孤身一人深入上游罐子村和石圪节村，以头拍砖的江湖手法力挽狂澜以及田润叶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再加上演员王雷强势和带有浑不吝气质的表演，孙少安被塑造成了一个具有先知先觉的个人英雄主义气质，同时又带有一丝乡村无产者的特征，却又不失乡村伦理中孝义仁厚、勇于承担的当代农村英雄，

这与小说中塑造的那个既想改变现状却又有些逆来顺受的孙少安判然有别。

令人惊奇的是，在最近20多年关于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的讨论中，几乎很少涉及孙少安的评论。也就是说在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中，孙少安几乎是一个无法言说的角色，相比于电视剧中的浓墨重彩、极尽渲染，这确乎是意味深长的。

田福军那条线与孙少安的线是呼应的。田福军是一个改革家，在电视剧中，他改革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让“黄原农民从吃黑面馍变成吃白面馍”，而没有顾及改革是涉及社会关系的重组、利益关系的重新调配、新的价值观的确立等一系列问题的全面工

程。所以，编剧在电视剧末尾添加了一段田福军的妻子无意中收受装了钱的茶叶罐，从而被“受贿”的情节时，看似突兀，但更意味深长。

孙少平那条线本是路遥用力最著之处，通过少平的成长和出走，时代巨变过程中遗留在普通人身上的伤痛、挣扎、自尊等价值得以显现，也只有在少平这里，“平凡”才最后通向了“世界”。但在电视剧中，孙少平的故事线被简化为爱情线，他关键的出走由于离开了对尊严、价值、无限可能性的追求，而在一种物质回报的逻辑里变得不易理解。

因此，在电视剧中，我们能感觉到孙少安是一位“今人”，是今天农村中的当代英雄。无论是在“农村强人和乡镇企业家”的逻辑中，还是在后寻根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语境下，他的故事和人格都充满魅力和可书之处，因为在第一个逻辑中，少安是农村新历史的创造者，在第二个语境下，少安身上被想象出的无论是强悍、精明还是仁义、担当，都成了想象中的传统文化的投射。实际上，孙少安的故事也在相当程度上笼罩了当今的农村叙述。

相反，电视剧中的孙少平却如一位“古人”，他固执的出走、他持守的自尊、他对知识和远方的执着已显得古板、陌生，他只能披上一些当代的外衣，比如他与田晓霞的精神之恋，才能被辨认为一个当代的人物。

孙少平的“被历史化”耐人寻味：我们无法将孙少平当代化，因为在今天，我们已很少有可能看到孙少平身上体现出来的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个人价值的可能，我们也很难理解凝结在一个底层人身上的基于劳动和自我超越之上的自尊和动力。在农村，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为集体劳动失去了价值依托，劳动只是在换取物质报酬的意义上才能被理解。用马克思的概念，劳动被等同于它的交换价值，劳动创造世界的本质被掩盖起来了。因

此，我们可以理解孙少平因下煤矿不打工而用多领到的工资换取同屋工友的各种稀罕物，却不能理解他自虐式的揽工汉生活，更不能理解他将劳动变成一种精神的磨砺，一种人格上的蜕变。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纯粹乡村共同体已经解体的时代，几亿农民工进城打工，大规模的城镇化正在展开。实际上，文学批评界讨论“乡村叙事的终结”也已多年。所以，当我们讲述今天的中国农村时，我们的想象中只会有“老农民”，而当农民“老”去，农民在形象和人格上也不再能直起腰来，我们只能以既有的历史和文化安排去图解一种类型化、抽象化的“老农民”，正像去年热播的电视剧《老农民》那样，他们形象不可能高大，目光不可能长远，一切行为似乎只能在追逐私利的逻辑上才能被理解。在这点上，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一种处理方式颇具症候性：每当镜头拉远，双水村或黄原就被笼罩在一个看似用电脑做出来的梦幻般的穹顶下，变幻不定、转瞬即逝的背景，似乎就是一个关于当代农村的隐喻。

事实上，怎样表现底层农民的自尊和奋斗，表现农民中的“新人”，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最具挑战性的议题，离开了“新人”的塑造，当代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无法想象，而路遥小说中孙少平这个不断游走的奋进、自尊的文学青年式的新农民，也可以被理解为当代农村“新人”画廊中的形象之一。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我相当程度上肯定去年热播的另一部农村剧《马向阳下乡记》，它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向当下农村问题及其情感和人心的开放姿态，而且，那里的农民并未“老”去，农村里的事似乎还可以“有的商量”，而并未事件化、喜剧化。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我愿意寄望于更多贴近农村和农民的作品出现：真正的乡村叙述不是终结了，而是还没有开始。

艺术·镜头

《道士下山》演绎民国武林

本报讯（记者张婷）3月31日，电影《道士下山》“笑里藏道”主题发布会在京举办。导演陈凯歌携主演王宝强、范伟、林志玲亮相。



《道士下山》取材于电影《一代宗师》编剧徐皓峰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小道士何安下为了躲避粮荒，下山谋生，遭遇了一系列神秘人物和事件。作为陈凯歌睽违3年的回归之作，影片拍摄长达213天，不仅汇集了国内超强明星阵容，还吸引了好莱坞顶级幕后团队，主创们力图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中美合拍大片，呈现不一样的民国武林。

发布会上，几位主演纷纷表示对该片充满感情，因工作受伤的宝强腿上打着钢板，也要坐轮椅上台完成整场发布会。陈凯歌对王宝强的表现赞赏有加：“这个戏中，王宝强真是把‘真、

憨、呆、萌’表现得淋漓尽致，演活了何安下这个人物。”

谈及影片“一门之隔、两个世界”的含义，陈凯歌说：“走出道观的何安下如同离开大学的学生，从跨出校门走进社会的那一刻起，一切都改变了，想象和现实还是存在差别。”

据悉，该片由新丽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美国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和21世纪福克斯影视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将于7月3日全国上映。

《捉妖记》大胆改编中国神话传说

本报讯（记者张婷）奇幻爆笑电影《捉妖记》日前在北京举办发布会，宣布该片将于7月16日全国公映。

该片根据中国神话传说改编，构建了一个奇幻世界，讲述了一个平静的小山村中，主人公阴错阳差养了一个小妖王，之后和捉妖天师一起冒险的故事。

影片由白百何、井柏然、钟汉良等担纲主演，汤唯、姚晨加盟演出。值得一提的是，电影最重要的特效部分由好莱坞顶级团队负责，团队中包括《星球

大战》首部曲、《侏罗纪公园》、《盗梦空间》、《冰雪奇缘》的制作人和《变形金刚2》、《哈利·波特》、《加勒比海盗》系列的制作人。

《捉妖记》制片人透露，该片导演许诚毅此前在梦工厂动画公司参与过《怪物史莱克》、《功夫熊猫》等多部知名动画片的创作，此次与其合作，希望能创作一部有东方特色的、能和好莱坞怪兽题材大片抗衡的东方“妖”巨制。

史诗故事片《大火种》开机

本报讯（记者张婷）大型史诗性故事片《大火种》日前在京举行了开机仪式。

《大火种》根据铁流、徐锦庚荣获2014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长篇报告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改编，由知名导演苗月执导，陈瑾等主演。影片以1926年发生在山东省广饶县的一个真

实故事为原型，讲述了《共产党宣言》是如何克服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如火种般在人民群众中传递的故事，再现了风雨飘摇的旧社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群众对旧制度的痛恨和对新世界的期盼。

据悉，该片有望于今年下半年与观众见面。

艺术·影评

让人感动，更叩问心灵

——观电影《失孤》

罗群

《失孤》这个名字，从字面解释仿佛有点困难，是失去父母的孤儿还是失去孩子的孤独的父母抑或其他？意思可以多种阐释的两个字却很有意思，因失去而孤独，所以要寻找，“失孤”二字写意地点染着影片的主题。

打拐题材很有可能把电影引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煽情，或是恨不得把人贩子撕碎的愤怒，以致一味要观众感动或愤怒而妨碍了更深层的思考和作品伦理价值的挖掘。笔者从不认为让观众哭得稀里哗啦是一部艺术作品的优点，把观者的情绪控制在眼泪在眼圈中打转但还没有流下来的那一瞬间，才是艺术家的本事。《失孤》对整体画面风格和叙事基调的控制还是很出色的，尽管要表现主人公对各种偏僻的地方寻子，但是电影画面并没有把偏远地区的生活底层场景处理得阴暗压抑，刺激观众的观感，无论是福建渔村还是那些有铁索桥和竹林的村庄，画面色彩始终是明快的，镜头里时常出现大片大片的绿色，让人心怀温暖和希望。

与对画面风格的把握相应，影片的叙事基调也张弛有度，悲情与欢快相协调。当你感到主人公风餐露宿一路奔波太过辛苦，影片就呈现一段雷泽宽与曾帅互相泼水、打闹的情节以为调剂；当你觉得他们打工洗碗后与老板娘的对话有点滑稽，影片马上就给你看曾帅躺在雷泽宽腿上，在露天地板上过夜的凄凉情状。一个是寻找孩子的父亲，一个是寻找父母的孩子，两人暂时的相依为命有一种超乎父子之爱的动人情感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深沉理解。

谈到画面，不妨顺便谈谈人物的造型。刘德华饰演的坚持寻子十多年的农民父亲雷泽宽，瘦削的身材，一道连着一道的皱纹，脸上、身上的污迹诉说着这位父亲十数年来奔波的艰辛和笃定。井柏然扮演的曾帅年轻帅气，打扮时髦，不少论者吐槽曾帅太时尚，不像个孤儿。但笔者恰恰以为，曾帅的造型设计匠心独运——

曾帅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他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因为“来路不明”而失去爱情。因此，他的内心一定渴望被社会接纳，渴望自己能像其他同龄人那样生活，所以他必须把自己打扮得时尚、干净，与他的同龄人没有差别，他恨自己是弃儿，所以不肯轻易让人看出自己是弃儿，这样的外貌是他被社会、被他人认同和接受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他外表越是帅气，就越反衬出内心的悲凉与渴求认同的迫切，这个道理类似古诗文中以乐景写哀情。那些认为孤儿形象必须是脏兮兮的可怜相的论者可以清醒一下了，刻板印象是艺术创作和评价中最应消灭的东西之一。

《失孤》对人物的塑造细腻、精确，这不仅体现在两位主人公的外表上，更体现在他们的行为逻辑上。比如雷泽宽，他历尽艰辛来到福建的一个渔村，去见有可能是自己儿子的少年，一路上雷泽宽紧紧抓住船带的手暗示着他的紧张和忐忑，可惜这少年的细节特征与自己的儿子并不相符，雷泽宽只好悻悻而去。船走到半路，雷泽宽发疯一样地要求返回，想要拉着少年去做亲子鉴定，其实他明明知道少年不是自己的儿子。雷泽宽的这一行为看似不合常情，却深刻地表现出一位寻子十余年的父亲内心的疲惫、脆弱和对儿子的渴望。一位坚强的父亲面对明知是虚妄的所谓希望时表现出的脆弱和矛盾具有相当的人性心理深度。

曾帅与雷泽宽一起吃饭的一场戏对人物心理深度的挖掘也很深入——雷泽宽给曾帅夹菜，曾帅却都夹了回去。曾帅内心深处埋怨父母把自己弄丢，虽然养父待曾帅很好，但他知道那不是自己的父亲。他对父子亲情既渴望又觉得陌生，对亲生父母既想要找寻又放不下心里的怨恨。面对与自己父亲年纪相仿的雷泽宽的照料，曾帅的反应非常准确地表现出他内心深处的矛盾与微妙。



影片中这样的细节很多，比如吴君如饰演的人贩子抱着拐来的孩子寻找买主时，她背后的墙上挂着“美丽家园”的标语，多么讽刺！

有人说《失孤》的缺点之一是没有讲述完整的故事，那么笔者要反问：经典影片《罗生门》讲述了什么完整故事呢？《失孤》的故事逻辑自足且对塑造人物来说恰到好处，有些情节看似旁逸斜出，却从另外的角度回着主题。比如那位丢了孩子的母亲，她常常穿着同一件衣服徘徊在街头，最后从高高的大桥上跳入河中自杀。有观众感到这个人物的出现莫名其妙，笔者则不以为然。影片中曾帅的功地上找到了父母，雷泽宽永远在寻子的路上，然而不是每个被拐儿童和失去孩子的父母都如他们这样幸运或坚强。那位母亲永远穿着一样的衣服，那或许就是孩子走失那天她穿的衣服，她一心寻找孩子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外貌，苦等无果而深感绝望。这个人物的死去构成了完整的失去孩子的父母的众生相，一个生命的逝去把对拐卖儿童行径的控诉推向高潮。

其实，《失孤》带来的更多思考是在深层的伦理层面。曾帅的养父母对他很好，养父家的姐姐也对他很好，虽无血缘关系，但十多年的共同生活培养出割舍不下的情感。当养父得知曾帅要去寻亲，养父提出：如果曾帅找到了亲生父母，他希望曾帅能够娶养父家的姐姐，这样养父与曾帅仍是一家人。养父一家当年买来曾帅固然有错，但十余年相处的付出与感情却是真的，曾帅的离去是否也会对养父一家造成感情上的伤害？影片对曾帅是不是娶了养父家的姐姐没有交代，法理可以用理性解决很多问题，但是伦理上的困境恐怕是很难解决的。办户口、办身份证等法律程序可以帮助被拐儿童重回社会，但是他们心灵上的创伤要如何安抚？与分隔十余年、几乎没有共同记忆的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曾帅不是真的会幸福呢？

拐卖儿童的行径除了触犯法律，更给人的心灵带来深深的伤害。影片结尾雷泽宽骑着摩托走着的那条路，很长很长，人类通向伦理之善的旅程不也正如此吗？